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65

2008年9月10日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興起和未來衰亡： 比較分析觀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¹

這篇文章寫於1972年，並與《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於1974年同時發表。在這篇文章中，我初次嘗試解釋“分析單位”原意，並由此亮出了有關世界體系分析的主要的理論前提，指出我想反駁的學術觀點。這篇文章已成為我所有文章中被再版和引用得最廣泛的一篇，且常常是學生們讀過的我的惟一一篇文章。基於此，這篇論文已成為“經典”之作。

當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多之時，即出現所謂的“工業革命”，隨之而來的是一股強勁的現代思潮。這種

¹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第93~134頁。

思潮將此種變革定義為一個有機的發展和進步的過程。有些人認為這些經濟進展以及相應的社會組織的變化是產生於世界進程的倒數第二個階段中的。這一階段要取得最終成效，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這些人包括各種各樣的思想家，比如聖西門、孔德、黑格爾、韋伯以及迪爾克姆。還有一些批評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馬克思。他認為（如果你願意）當時 19 世紀所處的階段僅僅是發展進程的倒數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資本主義世界正面臨一場突變的政治革命，這會使資本主義世界完全走向最終的社會形式——無階級社會。

馬克思主義的最大優點之一便是，作為一種反對和批判的學說，它要求人們不僅要重視現行世界體系的矛盾，而且要重視它的思想家的矛盾，其依據是從歷史現實中得出的經驗。這些歷史現實揭示出那些不適合解釋社會世界的各種模式。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在抽象化的模式中看到了具體的合理化，並基本上通過指責其對手未能成功地分析社會整體而為自己提供論據。正如盧卡奇（Lukacs）所指出的：在歷史的解釋中構成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根本不同的不是經濟動機的首要地位，而是整體觀。²

在 20 世紀中期，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的核心國家中佔主導地位的發展理論，在理論分析方面與 19 世紀時期採用此種分析模式的前輩相比，並未增加多少東西，僅僅是通過給這些模式添加史詩般的尾聲以解釋與實際期望之間的日益增多的偏差，從而增加了對這些模式的定量分析，並使這些模式進一步抽象化。

這些模式的錯誤之處已經多次並從許多方面表現出來。我僅僅引用一個非馬克思主義的評論家羅伯特·尼斯貝特（Robert Nisbet）的觀點。他對被其稱為“西方發展理論”的令人信服的思考是通過以下結論加以敘述的：

² George Lukacs: “The Marxism of Rosa Luxembur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Press, 1968), 第 27 頁。

如果（我們）所尋求的是真正的社會模式和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的原因、起源和條件，那麼我們就要也只能求助於歷史。相反，在現代社會理論中借助於傳統智慧是無法在那些從歷史中抽象出來的研究中找出對變化的解釋的。這些研究要麼是在社會實驗室中的小群體的研究、廣泛的群體動力學和社會互動作用的階段性實驗，要麼是有關所謂社會體系的數學分析。一種通過從所有空間和時間中找取文化相似點和文化差異的上昇階梯的比較方法，在現代社會中得以復興。但在這種比較方法中，我們也不可能找到變化的根源。³

我們能否求助於批判學派，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來給我們更好地解釋社會現實？原則上是可以的，事實上卻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通常是自相矛盾的馬克思主義闡釋形式。但更為基本的是，如今在許多國家，馬克思主義已成為官方的國家學說，不再像在 19 世紀時那樣，是一個單純的反對派學說了。

這些官方學說的社會命運是這樣的：它們不斷受到來自社會的關於武斷、狡辯、艱澀難懂等方面的指責，但卻又不能反駁。而且，它們也常常同那些非歷史的構建的模式一樣，陷入理論上的絕境。費爾南德·布羅代爾下面的評論最能反映這一狀況：

馬克思主義是這些模式的結合。……我所反對的……或多或少地……不是這個模式本身，而是那些自以為是的人們對它的運用。馬克思的精神實質及其擁有經久不衰的魅力的秘密在於馬克思是第一個用長遠的眼光（長時段）構建真正社會方式的人。這些方式已被永久地固定了一個簡單的層面上；它們被賦予法律效力，並被當成是現成的、自動的解釋，且適用於所有社會的各個方面。……這種方法嚴重束縛了 19 世紀的最有權威性的社會分析的創造力。

³ Robert A. Nisbet: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第 302~303 頁。我本人對經濟歷史文獻的這種批評不作評論。

只有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後，它才能恢復生機和活力。⁴

只有用階段觀念中衍生出來的困境論才能解釋清楚對社會變化模式的非歷史性曲解。如果我們要研究長歷史時期（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的社會轉變，如果我們要解釋其連續性和轉變，那麼，我們就必須從邏輯上將這一個長時段分為若干個階段，以便考察時間段 A 到時間段 B 之間的結構性變化。然而，這些階段事實上不是中斷的，而是連續的；因此，它們是一個社會結構發展進程中的各個“階段”，而我們所能確定的發展進程不是先驗的，而是後驗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具體地預測未來，卻能預測過去。

當比較這些“階段”時，關鍵是要確定單位，而這些“階段”只是單位的共時性的模像（如果你願意也可稱“理想的類型”）。非歷史的社會科學（包含馬克思主義的非歷史版本）所犯的根本錯誤便是將這個有機整體的各部分具體轉化為一些單位，並將這些具體化的結構進行比較。

例如，我們可以記錄農業生產的分佈模式，將農業生產分為自給作物和經濟作物。然後我們可以視之為構成一個發展進程的各個階段的實體。我們也可以討論農民群體有關轉變生產模式的選擇。我們可以把其他的局部實體，比如國家，描繪成擁有兩種獨立的“經濟”，每種經濟以農業生產的不同的分佈模式為基礎。如果我們記錄下這種連續步驟的每一個，而所有的步驟都是錯誤的，我們就會像眾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研究世界上那些所謂的不發達國家時那樣得出“二元經濟”的錯誤觀點。更糟的是，我們會像羅斯托一樣，將大不列顛歷史錯誤地具體化為一系列普遍性的“階段”。

⁴ Fernand Braudel：“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eter Burke 編：*Economy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2），第 38~39 頁。

馬克思主義學者已經多次陷入完全類似的困境。如果我們分析農業勞動的支付模式並將“封建主義”模式（勞動者被允許保留部分農產品以維持生存）與“資本主義”模式（在其中同樣的勞動者所有的產品全部交於土地所有者，而以工資形式收回部分農產品）進行比較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將這兩種模式視為一個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我們可以說“封建”地主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止農業勞動支付形式向工資制度的轉變。這樣，我們便可以解釋這樣一個事實，即在 20 世紀時的一個局部實體（比如說一個拉美國家）由於存在這樣的地主統治而仍未能實現工業化。如果我們按照這種連續的、但全都是錯誤的步驟進行分析的話，我們會得出這樣的錯誤結論：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也可能存在“封建因素佔統治地位的國家”。但是正如安德雷·岡德爾·弗朗克所明確闡述的那樣，這種神話相當長時間內在拉丁美洲“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佔據主導地位。⁵

對這些被比較實體的錯誤認定，不僅導致我們形成錯誤觀念，而且也產生了一個莫須有的問題：各種階段可以被跨越嗎？如果我們所說的這些“階段”“共同存在”於一個單一的經驗結構中的話，那麼這個問題便僅僅具有邏輯上的意義。如果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我們界定一個狀態是封建主義，第二個狀態是資本主義，第三個狀態是社會主義，那麼這時，也只有這時我們能夠提出這個問題：一個國家能夠不“經過資本主義”狀態而直接從封建主義階段“跨越”進入民族發展的社會主義階段嗎？

但是如果沒有諸如“民族發展”一類的東西（如果我們將其視為自然的歷史過程），而且如果用以比較的合適的實體是世界

⁵ Andre Gunder Frank : Ch. IV (A) , “ The Myth of Feudalism ” ,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67) , 第 221~242 頁。

體系的話，那麼所謂“跨越階段”的問題純粹是一派胡言。如果一個階段能被跨越的話，那它就不是一個階段。而且我們是後驗地知道這一點的。

如果我們要而且應當討論階段的話，那麼這些階段必須是社會體系中的階段，也就是說，是隸屬於一個整體的各個階段。只有現存的或歷史上存在過的整體才是局部體系和世界體系；而在19~20世紀時，僅存在一種世界體系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

我們認為社會體系的特徵便是其內部存在勞動分工，這導致各部門或各地區依賴於同其他部門或地區進行經濟交換，以源源不斷地、穩定地滿足本地區的內部需要。這種經濟交換的進行不需要共同的政治制度，甚至更明顯地不需要同樣的文化。

一個局部體系就是一個其內部擁有完全的勞動分工、且擁有單一文化結構的實體。這樣的體系只可能出現於單一的農業社會或漁獵和採集社會。這樣的局部體系在當今世界已不復存在。而且，這種體系在過去的存在比人們常常認為的那樣要少，因為任何這樣的通過向一個帝國進貢即支付“保護費”⁶而與一個帝國緊密相連的體系，由於它已不再擁有自我封閉的勞動分工而不復存在。從這個角度而言，貢品的支付按波拉尼的說法，標誌著從互補經濟向加入一個更大規模的再分配經濟的轉變。⁷

除去現已逝去的局部體系之外，剩下來的惟一的社會體系便是世界體系，我們將其簡單定義為一個帶有單一勞動分工和多元文化體系的單位。然而在邏輯上，世界體系又有兩個變種，一種

⁶ Frederic Lane 對“保護價格”的討論，該討論被作為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的第三部分重印。有關貢稅的特別討論，見第 389~390、416~420 頁。

⁷ C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sen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編: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 (Glencoe: Free Press, 1957), 第 243~270 頁。

變種有共同的政治體系，另一種變種則沒有。我們將兩者分別命名為世界帝國和世界經濟體系。

經驗表明，在歷史上，世界經濟體系起初是不穩定的結構，常被一個群體瓦解或征服，從而轉化為一個世界帝國。這種從世界經濟體系轉變而來的世界帝國的很多例子就是所謂的前現代的偉大文明古國，如中國、埃及、羅馬（每一個都在它的一定的歷史階段成為帝國）。另一方面，所謂的 19 世紀時期的帝國，比如大不列顛或法國，根本不是世界帝國，而是存在於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擁有殖民地附屬物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s）。

世界帝國在經濟形式上基本上是重新分配型的。毫無疑問，世界帝國豢養了一群從事經濟交換（首先是遠程貿易）的商人。然而這些商人群體，儘管是龐大的，但也只是整個經濟體系的一小部分，並不能從根本上決定經濟體系的發展命運。此種遠程貿易往往是正如波拉尼所述的“行政貿易”，而非市場貿易，未利用“貿易港口”。

僅僅是隨著 16 世紀歐洲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出現，我們才看到了市場貿易的充分發展及其在經濟中的統治地位。這就是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體系。資本主義和世界經濟體系（即單一的勞動分工以及多元政治和文化）是兩個相對應的共生事物，就像硬幣的正反面一樣，兩者之間無因果關係。我們僅僅是在用不同的特徵定義相同的、密不可分的現象。

16 世紀這種特殊的歐洲世界經濟體系是怎樣以及為什麼沒有轉變成一個進行再分配的世界帝國，而是穩定地發展成為一個我已在別處闡釋過的⁸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本文所討論的主題，並未過多地涉及這一世界歷史轉折點的起源。這篇論文只是

⁸ 見我的：*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被用來作一個概念上的工具，導入對此種精確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框架下的發展進程進行分析。

因此，讓我們回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問題上來。我們將尋求解決兩個似是而非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由於沒有分析整體的困境而產生的：即所謂的封建主義形式的持續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創造的產生問題。在解決過程中，我們提出一種用以比較分析的替代性模式，這一模式根植於歷史上確切存在的整體，即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我們希望由此表明並非具有歷史意義的特殊性的東西就不具有普遍性的分析意義。恰恰相反，通往獲取合理觀點的惟一途徑就是進行歷史的具體分析。就如在宇宙學中一樣，通往控制宇宙法則的惟一之路是通過對同一宇宙的歷史演變過程進行具體分析。⁹

在有關“封建主義”的討論上，我們將採納弗朗克的“欠發達的發展”觀為開場白。弗朗克的觀點是：當今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不是傳統社會與“發達”社會進行聯繫的那種形式，也不是向工業化轉型期的一個早期階段。它是作為世界體系中的邊緣地區、原料產地而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果；或者像弗朗克對智利闡述的那樣“欠發達……是資本主義本身四個世紀以來發展的必然產物”。¹⁰

這種觀點與大量的發達國家的文獻是相反的。這些文獻寫於1950~1970年，主要內容是尋找一些解釋非體系（比如“國家”或者“文化”）之中的“發展”的因素，而且一旦發現了這些因素，

⁹ Philip Abrams 用下面的警告作了相似的答辯：“那時，歷史學和社會學的學術和知識的分離產生了使兩個學科不去認真地參與有關理解社會轉型的最重要的討論的影響。”“The Sense of the Past and the Origins of Sociology”，*Past and Present*，No. 55，May 1972，第32頁。

¹⁰ Andre Gunder Frank：Ch. IV（A），“The Myth of Feudalism”，*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第3頁。

就促使他們在不發達地區進行模仿以作為救世之道。¹¹

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弗朗克的理論也反對已為人廣泛接受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即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及知識分子階層中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比如，在拉美地區）。這種正統“馬克思主義”在弗朗克及許多其他人提出批評之前以及以古巴革命及其後果為代表的政治現實出現之前，認為拉美國家或多或少處於前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封建社會。近來，在拉美的分析已經轉而集中於圍繞“依附”觀進行。¹²

然而，最近恩納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對弗朗克進行了抨擊。拉克勞批評弗朗克在同意對二元學說的批評的同時拒絕將拉美國家歸為資本主義國家一類。相反，拉克勞宣稱，“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定義的層面上，包括各種生產方式”。他指責弗朗克混淆了兩個概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參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¹³

當然，如果這僅僅是一個定義問題的話，那就沒什麼可爭論的了。而當它被降為一個語義學問領時，爭論就不再有多少意義了。而且，拉克勞堅持認為這一定義不是他的，而是馬克思的，這使得問題更具爭議性。在馬克思對這一特殊爭論的含糊不清的或不一致的論述上，羅薩·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找到了一個關鍵因素，而這一含糊不清的論述，也促使弗朗克和拉克勞描繪他們對馬克思的思想認識：

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詳細地描寫了佔有式的、非資本主義

¹¹ Frank 對這些理論的批評（現在成為經典性的）題為“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並且被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重印，第 21~94 頁。

¹² Theotonio Dos Santos： *La Nueva Dependencia*（Buenos Aires：s/ediciones，1968）。

¹³ Ernesto Laclau（h）：“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No. 67，May-June 1971，第 37~38 頁。

的生產方式（注意：盧森堡提到的邊緣地區在強制勞動條件下生產的初級產品 — I. w.）的進程以及農民向資本主義無產階級的轉化。《資本論》第一卷第 24 章描寫了英國無產階級、資本主義農業佃農階層以及工業資本的起源，並著重強調了歐洲資本對殖民地國家進行的掠奪。然而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一切只是被僅僅視為所謂的原始積累。對馬克思而言，這些過程並不重要，僅僅是說明了資本主義的起源以及它在世界上的最初表現，它們（也確實是）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脫胎於一個封建社會的陣痛。他只要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流通過程，就能再次證實資本主義生產統治的普遍性和排他性（注意：盧森堡說那就是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¹⁴

然而，這個爭論中畢竟存在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實際上，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摩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保羅·斯威茲（Paul Sweezy）之間有關近代歐洲早期發生的“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的爭論中，¹⁵ 就潛伏著同樣的實際性問題。我認為，這一實質性爭端涉及到一個用於比較的恰當的分析單位。從本質上看來，儘管斯威茲和弗朗克在這一點上表達得都不太明

¹⁴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dern Reader Paperbacks, 第 364~365 頁)。然而，很明顯 Luxemburg 因使用“資本主義的”和“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術語而使自己進一步陷入混亂。撇開這些術語不說，她的視野是完美的：“從實現剩餘價值和生產流動資本的物質因素方面來看，國際貿易是資本主義歷史存在的首要條件 — 這種國際貿易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和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基本的交換”（見第 359 頁）。關於核心地區對邊緣地區僱傭勞動的需求，她同樣顯示出了真知灼見。她將其稱為“可變資本的增長”（見第 361 頁）。

¹⁵ 爭論始於 Maurice Dobb 的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6)。Paul Sweezy 對 Dobb 的批評連同 Dobb 對同一問題的“答復”見“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2, Spring 1950, 第 134~157 頁。自那以後，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紛紛參與這一問題的討論。我在前引我的著作的第一章中對這場辯論作過評論和討論。

確，而多布和拉克勞能指出似乎明確地表明更加忠實地反映馬克思觀點的馬克思的文本內容，但是我相信斯威茲和弗朗克卻更好地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精髓而非單純的字面意義。¹⁶ 並且和其對手相比，他們在描繪的理論圖畫中雖未提及馬克思，卻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過去確實發生的和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從分析和歷史的角度看，拉克勞構想了什麼樣的理論圖畫？這一問題的核心圍繞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明確特徵的自由勞動的存在：

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關係是自由（黑體為我所加）勞動者出售其勞動力而構成的，但其必要前提是這些勞動者直接喪失了其生產資料……

如果我們現在正視弗朗克的論斷，即自從征服時期以來，拉美的社會經濟總體就已是資本主義的了，……從現有的經驗證據來看，我們必須斷定有關“資本主義”的論點是無可辯解的。在有著稠密的土生人口的地區——墨西哥、秘魯、玻利維亞或危地馬拉——直接生產者並未被剝奪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同時使勞動服務的各種體系不斷擴大的超經濟強制……卻在逐漸增強。在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中，經濟是以由奴隸勞動構成的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而在礦業地區，許多隱藏的奴隸制形式及其他種類的強制勞動也在不斷發展。這種強迫勞動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的形成為某種相似之處。¹⁷

¹⁶ 它將我們帶入一個長期的討論以捍衛這樣的觀點：像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一樣，馬克思既是他所在的社會環境的囚徒，又是能夠不時從更寬闊的進步的視野有所發現的天才。前面的馬克思從英國歷史中得出結論，後面的馬克思則是已經喚起一個社會現實的批判性的觀念結構的人。W. W. Rostow 不經意地試圖通過提出一個來自英國歷史的可能的歸納而駁斥前面的馬克思。他忽視了後面的和更有意義的馬克思。見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0)。

¹⁷ Ernesto Laclau (h) :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第 25、30 頁。

這就是問題之所在。西歐，至少是英國，從 17 世紀晚期時起，就有了最初的、無地的、以工資為生的勞動力；而拉丁美洲，從某種程度上說，直到現在勞動力都未成為無產階級，仍為奴隸或“農奴”。如果有無產階級的話，那麼就已經是資本主義了。當然，這一點是很肯定的。但是，英國或墨西哥或西印度群島，是一個分析單位嗎？是否這幾個地區各自有一個不同的生產方式？或者（就 16~18 世紀而言）那個單位就是歐洲世界經濟體系，其中包括英國和墨西哥嗎？如果是的話，那麼，這個世界經濟體系的“生產方式”又是什麼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讓我們關注另一個爭論，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在 20 世紀 60 年代展開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爭論。這場爭論是以馬克主義政黨的思想發展史為大背景的。

人們已經經常注意到，實際上馬克思對革命後的政治進程並未說什麼。倒是後來，恩格斯在其題為《無產階級的專政》的著作中提到過。後來，列寧在他的小冊子《國家與革命》中，對這樣的“專政”理論進行了詳細闡述。這本小冊子出版於 1917 年 8 月，即布爾什維克接管俄國之前的最後階段。布爾什維克掌權時刻的來臨，引起一個有關建立什麼樣政權的爭論。最終，在蘇維埃思想中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區分，即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視為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兩個不同階段，一個階段在當時就可以實現的，而另一個只能在將來實現。1936 年，斯大林宣稱蘇聯已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還不是共產主義國家。因此，我們現在又基本確立在資產階級統治之後存在三個階段：革命後臨時政府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階段及最終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共產黨在各個東歐國家中建立了自己的各種政權時，這些政權都宣稱是“人民民主”政權，這是對革命後第一階段的

一種新稱呼。此後，一些這樣的國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宣佈他們已經進入第二個階段即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階段。

1961年，在處於前面所述的第二和第三階段之間，蘇共 22 大又發明了一個第四階段：即已變成一個“全民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階段，而且堅稱蘇聯當時已進入了這個階段。大會的綱領聲稱：“作為一個全民組織的國家，會一直存在直到完全實現共產主義。”¹⁸ 一個評論員對這個階段的“內在本質和主要典型特徵”作了如下描述：“這個全民的國家是世界上第一個沒有階級對立的階級鬥爭，因此也沒有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國家。”¹⁹

20 世紀 50 年代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分歧的一個早期表現就是圍繞“向共產主義逐漸過渡”問題而展開的理論爭辯。本質上，蘇共認為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實現這一過渡的進程上是不同的；而中共認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會同時進入共產主義。

我們知道，關於“階段”的最後一種爭辯形式毫無疑問地引起了分析單位的爭端。因為，實際上，中共一直認為“共產主義”不是民族國家的一個特徵而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特徵。這一爭論又通過意識形態的爭論轉入中國國內，並且現在知道它埋下了長期的深深的隱患，最終導致了“文革”的爆發。

這些關於“階段”辯論的一個推論之一便是：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革命後國家是否會持續存在著階級鬥爭。蘇共於 1961 年召開的 22 大就宣稱蘇聯已成為一個沒有國內階級鬥爭也不再對立階級的國家。1957 年，毛澤東未論及蘇聯，只是講了中國的情況：

階級鬥爭無疑不會結束……它將長期、曲折地存在著。而且有時甚至會變得特別激烈……在全國人口中，馬克思主義者仍然

¹⁸ F. Burlatsky : *The State and Communist* (Moscow : Publishers, n. d., circa 1961), 第 95 頁。

¹⁹ F. Burlatsky : *The State and Communist* 第 97 頁。

只佔少數，在知識分子中也是如此。因此，只有通過鬥爭，馬克思主義才會繼續發展……這種鬥爭永遠都不會結束。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馬克思主義發展自然也是如此。²⁰

如果這種鬥爭從來不會停止，那麼許多對有關社會主義國家要經過的“階段”的簡易歸納，便值得懷疑了。

在“文革”中，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中的上述文字得以確認並被引用，從而“完全否定了劉少奇提出的‘階級鬥爭熄滅論’”。²¹ 毛澤東很明確地說：“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並不代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中階級鬥爭的消失。”²²

實際上，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邏輯。毛澤東認為即使掌握了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和進行經濟改造（廢除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革命還遠遠沒有結束。革命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過程。毛澤東將這個過程稱為“社會主義社會”——我認為，這裡對文字的使用有點混淆，但沒有關係——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²³ 而且，“整個社會主義

²⁰ Mao Tse-Tung: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7th ed., revised transla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第37~38頁。

²¹ *Long Live The Invincibl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刊登在不定期的小冊子上，在1967年和1969年間發行（譯文見於 *Current Background*, No. 884, July 18, 1969, 第14頁）。

²² 這是被毛澤東在1962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發表的演講所採納的觀點（報道見於小冊子 *Long Live The Invincibl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第20頁）。毛的觀點隨後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上被正式確認。這次會議被前述小冊子描述為“中國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間暴力鬥爭的偉大轉折點”（*Long Live The Invincibl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第21頁）。

²³ 毛在第十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評論引自 *Long Live The Invincibl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第20頁。

社會的歷史時期都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²⁴ 1962年9月24~27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的觀點，省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用語，代之以“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階段，……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階段”。全會稱這一階段“會持續數十年，甚至會更長”，並且在此階段內“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以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²⁵

我們沒有獲得劉少奇的直接反駁論點。然而，我們可以將蘇聯最近剛出版的有關社會主義體系與世界發展關係的分析的書作為一種可能的觀點表達。該觀點認為戰後不知從何時起，“社會主義超出了一個國家的界限，成為一個世界體系……”²⁶ 它進一步提到：“資本主義出現於16世紀，直到19世紀才成為世界經濟體系。資產階級革命花了三百年才徹底推翻了封建貴族的統治。社會主義花費了30或40年時間積聚了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體系的力量。”²⁷ 最後，這本書談到“資本主義的國際勞動分工”²⁸ 和“國際社會主義的勞動合作”²⁹，並將兩者列為兩種對立的現象，從相反方向得出以下原則性結論：“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任領導人片面追求不同的道路，社會主義團結由此遭到了嚴重挫折。”該

²⁴ Mao Tse-Tung: “Talk on the Question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January 30, 1962, *Current Background*, No. 891, Oct. 8, 1969, 第39頁。

²⁵ “Communiqué of the 10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urrent Background*, No. 691, Oct. 5, 1962, 第3頁。

²⁶ Yuri Sdobnikov 編: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core and Prospects* (Moscow: Progress Publ., 1971), 第20頁。這本書由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學會的全體會員編輯，其資深撰稿人是V. Aboltin教授。

²⁷ Yuri Sdobnikov 編: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core and Prospects* 第51頁。

²⁸ Yuri Sdobnikov 編: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core and Prospects* 第26頁。

²⁹ Yuri Sdobnikov 編: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core and Prospects* 第24頁。

書將這一點歸咎於“毛澤東及其領導集團的超強民族主義”。³⁰

讓我們好好地對比一下這兩個觀點。毛澤東將“社會主義社會”重新視為一個過程而非結構。像弗朗克和斯威茲一樣，他一再含蓄地而非明確地將世界體系而非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相比之下，儘管社會主義體系已宣告分裂，但蘇聯學者的分析仍明確地認為在兩個並存的勞動分工基礎上存在著兩個世界體系。如果政治上分裂的話，那經濟上還會聯合嗎？幾乎不會有人認為會聯合；在這種情況下聲稱這個體系存在的亞結構基礎是什麼？是否這只是一個道義上的專橫？蘇聯學者是否以康德的形而上學為基礎來捍衛他們的思想觀念？

現在讓我們看看能否在一組一般的概念框架內重新解釋從上述兩種辯論中發展出來的那些爭端。這個框架可以用來分析世界體系的功能，尤其是分析現在已存在了大致四五個世紀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很特殊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功能。

我們必須首先從人們是如何證明一個單個的勞動分工的存在開始。我們可以將一個勞動分工看作本質上是相互依賴的網絡。經濟主體正在實現某種設想（很明顯，並非任何一個經濟主體對這一點都很清楚），即只要把他們的生產活動和貿易交往以某種形式結合起來，就可以在一個恰當的時機滿足他們的所有基本需求——包括生存、保護和娛樂等方面。而基本上在這些範圍內滿足大多數經濟主體期望的最小的網絡構成一個單個的勞動分工。

一個以年年進貢作為對外的惟一重要聯繫的小型農業社會，為什麼不能構成這樣一個單一的勞動分工呢？其原因就在於生活在農業社會中的人認為有關保障供給包括了與世界帝國的其他部分進行“交換”。

然而，有關交換關係的網絡觀念，以為必需品交換和所謂

³⁰ Yuri Sdobnikov 編：*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core and Prospects* 第 25 頁。

的“奢侈品”交換之間是存在著差異的。這種差異肯定源於經濟主體的社會認識能力，因此源於它們的社會組織和文化。這些認識能力是可以改變的。但如果我們不願陷入將每一個交換都看作是體系存在的證據的困境的話，那這個差異就顯得尤為重要了。一個體系（一個局部體系或世界體系）的成員，可以在有限的交換活動中，與位於體系之外的因素在體系的“外部區域”發生聯繫。

這種交換形式是非常有限的。兩個體系的成員可以進行奢侈品的交易。也就是說，每一方都可以出口在他的體系中認為不值錢的東西給另一方，同時也進口在他的體系中被認為很值錢的東西。這不只是一個迂腐的定義練習，因為這種兩個世界體系之間的奢侈品的交換在既定的世界體系的歷史演變中可能是極其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奢侈品的交換中進口者在“收穫意外果實”而不是在牟取利潤。貿易雙方可以同時獲取意外果實，卻不能只讓一方牟取最大利益。因為在一個體系內剩餘價值的交換是一場“零與和”的遊戲。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們正在揭示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本質特徵，即生產是為了在市場中銷售，目的在於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在這種體系中只要擴大生產能夠賺錢，那麼生產規模將會不斷擴展。同時，人們不斷改進生產技術以使產品獲得最高的利潤。古典經濟學家試圖聲稱，此種為了市場而進行的生產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人類的“自然”狀態。但是，人類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著作中，卻不大懷疑這種生產方式（即今天所稱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幾個可能存在的方式中的一個。

然而，自從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術辯論在工業革命時代佔據了一席之地之後，在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一直存在著事實上的混亂。這使得自由主義者在 1945 年之後陷入這樣的困境，即無法解釋一個原先的非資本主義社會——蘇聯是怎樣實現工業化的。最老練的回答是將“自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

義”假設為一個“工業社會”的兩個變體，而這兩個變體注定要彙聚在一起。這個論點已被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非常有力地闡述過。³¹ 但馬克思主義者，甚至馬克思也面臨同樣的困惑，即如何解釋：從 16~18 世紀即工業革命前的階段在歐洲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是什麼。本質上，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將這個時期稱為一個“轉型階段”，但實際上這是個模糊的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非概念。如果被用的分析單位是國家，那麼這個困境將會進一步深化。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就得解釋為什麼這種轉型在不同的國家會出現不同的程度和發生在不同的時期。³²

馬克思本人通過找出“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之間的差異來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這只是令人遺憾的術語問題。因為它導致和談及這個轉型階段的摩里斯·多布一樣的結論：

但是為什麼說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呢？一般說來，工人們並未無產階級化，即他們並沒有失去生產工具，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未失去土地。生產是分散的和非集中化的而不是集中的。資本家仍是佔優勢的商人，他們不直接控制生產，也不管理手工業者的工作。這些手工業者的勞動是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的，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獨立性（儘管此種獨立性是不斷減少的）。³³

有人也許會問：這到底為什麼？尤其是如果我們記得早些時候多布花了許多篇幅那麼強調資本主義是一個生產方式的話——

³¹ Raymond Aron : *Dix-huit lecons de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Paris : Ed. Gallimard, 1962) 。

³² 我感到這是 E. J. Hobsbawm 在解釋他的所謂“17 世紀的危機”時的困境。見他的在 *Past and Present* 上的論文，該論文（連同各種批評）被重印於 Trevor Aston 編：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5) 。

³³ Maurice Dobb : *Capitalism Yesterday and Today* (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8) ，第 21 頁。斜體是我加的。

那麼資本家又怎麼能首先是一個商人呢？——考慮到所有權是集中在一部分人的手裡和考慮到實際上資本主義並非是私有制的同義語，資本主義不同於這樣一個體系即體系中的所有者為“小農或小手工業者”。多布認為資本主義下私有制的明顯特徵是：一些人“被迫（為他自己的所有者）工作，因為（他們自己）一無所有，也沒（有）生產資料，（因此）也沒有其他的生活資料”。³⁴ 由於出現了這個矛盾，多布對他自己的問題作了回答（但我認為這種回答是軟弱無力的）：“很明顯，當形勢發生轉變，資方與勞方的關係仍未充分發展時，後者就已開始給自己確定基本特徵了”。³⁵

如果資本主義是一個生產方式，一種為了在市場中獲利而進行的生產，那麼我本來應該想到我們必須看看這種生產方式是否出現過。事實表明，這種生產方式正在出現，且是以一種牢固的形式出現的。然而，這種生產的大部分都不是工業生產。從16~18世紀在歐洲發生的是：從東北的波蘭向西、向南，一直擴展到整個歐洲及西半球的大部分地區的偌大的地理範圍內，產生了一種世界經濟體系。這一體系伴有單一的勞動分工，並存在著一個世界市場；在這個市場中人們為了出售和利潤而大量生產農產品。我毫不猶豫地將此稱為農業資本主義。

這就解決了將僱傭勞動的普遍性作為資本主義的明顯特徵而引起的問題。個人不再是一個剝削勞動者的資本家，因為國家會幫他支付工人的低廉工資（包括實物工資）並剝奪這些勞動者要求改變僱傭的權利。奴隸制和所謂的“農奴制再版”不再被認為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畸形產物。更確切地說，在波蘭的所謂農奴或16世紀世界經濟體系中處於西班牙經濟侵略下的新西班牙印地安人，都是在為領主從事經濟作物生產，而領主“支付”（這是個委婉的說法）

³⁴ Maurice Dobb : *Capitalism Yesterday and Today* 第 6~7 頁。

³⁵ Maurice Dobb : *Capitalism Yesterday and Today* 第 21 頁。

他們工資。在這種關係中，勞動力成了商品（與處在奴隸制之下相比，勞動力怎麼會變得更具商品性質呢？），11世紀勃艮第地區的封建農奴和其領主的關係完全不是這樣，在這個地區，經濟不是以世界市場為取向的，勞動力（因此？）無論如何不能買賣。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資本主義就意味著勞動成為商品。但是，在農業資本主義時代，僱傭勞動力僅僅是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被招募和獲得支付的衆多方式中的一種。奴隸制、強制的經濟作物的生產（我對所謂的再版封建主義的命名）、分攤勞作及租佃制都是可供選擇的方式。在世界經濟體系的不同地區，逐步形成不同農業產品的專業化生產的條件會需要很長的時間。關於這一點，我在別處已作過論述。³⁶

我們現在要注意的就是這種專業化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特定的和不同地理範圍的出現。這些地區之所以能夠專業化，是因為那些市場中的經營主體在其利潤不能再擴大之時，企圖阻止市場的正常運行。這種利用非市場工具以保證短期利益的企圖使經濟主體們便轉而求助於能夠實際上有權對市場發生影響的政治實體——民族國家。（另：在這個階段，他們為什麼不能轉向城邦國家這個問題曾使我們一度陷入無休止的討論之中。但是如果它是要保持各個貴族階層的收入水平，組合歐洲中世紀時的政治瓦解狀況，這個問題就必然牽涉到軍事狀況、航海技術以及15世紀時歐洲大土地所有者向海外擴張的需要。）

無論如何，當地資產階級——經濟作物的土地所有者（通常稱為貴族）和商人——處於這樣的狀況：一方面他們從非市場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正如自由主義歷史編纂學中所一貫強調的），另一方

³⁶ 見我的：*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第2章。

面又產生出對新的市場即歐洲世界經濟體系的市場的新的束縛。

由於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歷史的、生態的、地理的——西北歐比歐洲其他地區在16世紀擁有更好的實現其農業專業化的條件，並發展了某些工業（如紡織、造船及金屬冶煉）。西北歐成了這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地區，農業生產在較高的技術水平基礎上實現了專業化，這有助於（其具體原因太複雜而難以解釋）租佃和僱傭勞動成為一種勞動管理方式。東歐和西半球成了邊緣地區，專門出口穀物、金銀、木材、棉花及食糖——這一切有助於使用奴隸制及將強制的經濟作物勞動作為勞動管理方式。歐洲地中海地區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半邊緣地區，專門生產高檔工業品（如絲綢衣服）和進行信貸金融交易，其結果使分擔勞作成為農業區的勞動管理方式，並很少向其他地方出口產品。

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三個結構性位置——核心、邊緣、半邊緣——在大約1640年時已穩定下來。而為什麼有些地方處於這個位置而非那個位置，說來話長。³⁷ 關鍵原因就是各地區起點稍有不同，在西北歐各種地方群體的利益彙聚一起，導致強大的國家機器的發展；但在邊緣地區，地方群體的利益卻比較分散，導致形成一個非常弱小的國家機器。一旦我們注意到國家機器力量上的差距，我們便能明白強大國家對弱小國家、核心國家對邊緣地區強制進行的“不平等交換”³⁸的運作。因此，資本主義不僅包含所有者對勞動力的剩餘價值的攫取，也包含核心地區對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剩餘價值的攫取。這在農業資本主義階段和工

³⁷ 關於這個問題的主要論述，見“Three Path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II，2，Summer 1972，第95~101頁。

³⁸ Arghiri Emmanuel：*Unequal Exchang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業資本主義階段無不如此。

很明顯，在中世紀早期時，就有了貿易。但那時的貿易大多數是“地方性”的，即局限於被我們稱為“擴展的”莊園的地區，或者是“遠程的”、主要是奢侈品的貿易。沒有“大宗”貨物交易，也沒有跨中程規模的“物產”交易，因此，沒有專為此種市場而進行的生產。中世紀後期，據說可能出現了一些世界經濟體系，一個以威尼斯為中心，另一個以弗蘭德斯（Flanders）和漢薩（Hanse）的一些城市為中心。由於種種原因，這些結構由於 1300~1450 年的萎縮（經濟上的、人口上的、生態上的）而遭到破壞。直到 1450 年後出現歐洲勞動分工之後，資本主義才深深扎下了根。

從一開始，資本主義就是世界經濟體系內的事情，而非民族國家的事情。有人聲稱直到 20 世紀，資本主義才成為“全球性”的，這是對形勢的錯誤分析，儘管許多著作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都作出了這種定論。關於這一點的典型爭辯便是查爾斯·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在回答阿格希里·埃馬紐埃爾（Arghiri Emmanuel）關於不平等交換的討論的一段論述：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為全球化傾向透過以下現象表現出來：建立綜合民族經濟，形成一個複雜和具有等級的結構，包括一個帝國磁極及其統治對象；形成於不同“民族經濟”和不同國家之間的敵對關係；大資本不斷“超越”“民族界限”（“國際大資本”、“跨國公司”的形成等）。³⁹

這些評論忽略了以下事實：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資本家從來都不會甘心使其抱負受到國界的限制，而且，“國家”障礙的形成——一般是重商主義——已歷史地成為一個國家的資本家的

³⁹ Charles Bettelheim：‘Theoretical Comments’ in Emmanuel, op. cit., 第 295 頁。

防禦性工具，而且，僅次於體系中最強的力量。這就是 1660~1715 年英國對荷蘭、1715~1815 年法國對英國、19 世紀德國對英國、20 世紀蘇聯對美國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國家都製造了民族經濟障礙，其後果常常最終超出他們的預定目標。到如今，在這一過程的後期階段，那些要求國家政府實施限制措施的資本家，發現這些措施起到了限制作用。這不是“民族”資本的“國際化”。這僅僅是某個部門的資產階級的新的政治要求，這些人在真正的經濟市場中即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市場中，無時無刻地不在各個方面謀求最大利潤。

如果事實如此的話，那麼討論在此種經濟中的結構位置以及將國家界定為從屬於這些位置中的一個，其意義是什麼？為什麼談到這三個位置時，將“半邊緣”地區插入已被廣泛使用的“核心”和“邊緣”概念之中呢？核心國家極力增強國家機器以滿足資本主義土地所有者及他們商業同盟的需求。但是，那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機器是可以任意操縱的傀儡。很明顯，以往任何一個機構一旦產生都會因為兩個原因向其創立者要求自治權。其一，機構產生了一個官僚階層。這個階層自己的職業和利益是通過不斷地加強機構本身而強化的，然而，支持該組織的資本家的利益卻會不斷變化。國王和官僚們希望能夠長期掌權並不斷增加個人所得。其二，在創立強大國家的過程中，首要的是，必須在國家範圍內依靠其他力量，制定一些“憲法”條例。這些制度化的條例按照它們被設計時的初衷，應限制國家機器的管理者的決策自由。因此，任何一個參加過任何機構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明白了執行委員會從來都不會只反映選民的意志，那麼將政府視為“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的說法就是有根據的。

核心地區的國家機器不斷增強。與其相對的是，邊緣地區的國家機器不斷衰弱。16 和 17 世紀時的波蘭君主政體的衰落便是這

種現象的典型事例。⁴⁰ 對此，有兩個原因。其一，在邊緣國家，資本主義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當初的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是相對立的。他們的利益在於維持一個開放經濟以從世界市場貿易中牟取最大利潤（不要對本國商品出口及核心國家低價工業品的進口加以限制），削弱偏愛外部商人的商業資產階級（這些商人不會對地方政治構成威脅）。因此，從政府角度來看，它的確缺少在核心國家的、對政府起加強作用的力量聯合。

第二個原因，就是核心國家的強大的國家機器是用來削弱別國的國家機器的。這個原因在現代世界體系發展史上是相當重要的。因此，許多邊緣國家的命運就是遭到外部的介入，介入的主要形式是戰爭、顛覆及外交干涉。

所有這些都很清楚。我之所以反復強調只是為了說明兩個觀點。主要從傳統文化方面進行論證不能合理地解釋為什麼在現代世界體系發展史上的某一特定的時刻、各個國家的國家機器的力量是不同的，但如果從當時那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所起的結構性作用方面進行解釋是可以的。可以肯定的是，最初能夠勝任一個特定的角色，常常是由特定國家的偶然優勢決定的，而這個觀點所提到的“偶然優勢”無疑是針對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及地理範圍而言的。但是，一旦有了相對微弱的暫時優勢，那麼就得靠世界市場的力量來起作用，這些力量會強化這些差距，使之制度化並使之很難在短時期內被別人超越。

我們想要闡述的關於核心和邊緣地區結構性差異的第二個觀點是：這些差異並不十分廣泛，除非認識到存在著一個第三類結

⁴⁰ J. Siemenski : “ 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I, W. F. Reddaway 等編 : *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 (Cambridge :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0) , 第 416~440 頁 ; Janusz Tazbir : “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Gentry” , Aleksander Gieysztor 等 : *History of Poland* (Warszawa : PWN-Polish Scientific Publ., 1969) , 第 169~271 頁。

構位置即半邊緣地區的位置。這並不是在連續的特徵中隨意確立一個切入點的結果。在理解第三種類別是怎樣從指示曲線的比較關係中產生出來的時候，我們不僅用了歸納法，還用了演繹法。半邊緣地區可以保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平穩發展。這兩種世界體系——實行計劃經濟的世界帝國和實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都明顯地含有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因此，從邏輯上講，立即呈現在面前的一個問題是：這種依靠政治的體系怎麼可能持續下去？為什麼受剝削的大多數人沒有推翻攫取高額利潤的少數人？只要掃視一下歷史記錄就可以看到：這些世界體系很少面臨根本的體系性的叛亂。當內部長期充斥著不滿情緒時，要使世界體系受到侵蝕並最終走向衰落仍然需要一個相當長期的積累的過程，而在這一衰落過程中，有時外部力量也起到主要作用。

有三種主要手段可以使世界體系保持相對的政治穩定（不是指那些在體系中佔統治地位的特殊群體，而是指體系本身的繼續存在）。很明顯，首要問題是，統治力量必須掌握集中的軍事力量。這種手段的特徵與技術息息相關；這樣的集中絕對需要政治前提。然而儘管如此，真正的實力無疑是所要考慮的中心因素。

第二個手段是人們普遍在意識形態上對體系的整體承認。我不是指體系的“合法化”，因為這個術語是用於暗示體系的低等階層認為自己與統治階層關係密切或願意忠於它的說法。我懷疑這一直是世界體系能夠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我是指，體系（我沒能明確地解釋這個術語）內的行政職員或幹部會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他們的利益與這種體系以及領導者的能力是密切相關的。正是體系內的行政職員不但宣傳這個神話，而且他們對此深信不疑。

但是，如果從大多數中沒有分化出廣大的低等階層和少數中等階層，那麼，不管是實力還是行政職員在意識形態上的承認都不會管用。作為戰略變化的革命性的對兩極分化的呼喚以及自由主義式的對協商的推崇，被視之為開明政治之基礎，這兩者反映

了這個命題。在當代政治問題的分析中，進口貨物比它的使用範圍更為廣泛。這是一種擁有三層式結構的世界體系的基本的條件。當這個狀況中止時和如果這個狀況中止世界體系就會分崩離析。

在世界帝國中，中等階層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是來維持需求甚少的遠程奢侈品貿易；而上等階層則是集中力量控制可以收受貢品（這是重新分配剩餘價值的關鍵方式）的軍事機器。然而，通過提供一定的剩餘可以使仍處於前現代社會的閉塞地區城市化，從而使衆多仍處於隔絕狀態的初級產品的生產者產生政治凝聚力。於是，上等階層便有效地收買聯合叛亂的潛在領導階層。而且，無論商業區中等階層的經濟實力有多麼強大，上等階層都不給他們政治權利，並經常強制性沒收其財物。於是，中等階層可能開始創建自己的軍事力量。

在世界經濟中，此種“文化”的層次並非如此簡單。因為缺少一套單個的政治體系就意味著經濟作用的重心在整個體系內是垂直發展的而非水平發展的。解決方法就是要擁有三類國家，並使其每一種文化同化——因此，除了核心國家的上等階層和邊緣國家的下等階層之外，在半邊緣國家存在著一個中等階層。

這個半邊緣地區被認定為（曾經就是）一種特殊的經濟角色，但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多於經濟原因。也就是說，必須提出有利證據證明：世界經濟體系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即使沒有半邊緣地區，也能夠使每一部分都很好地運轉起來。但是，那將很難保持政治上的穩定，因為這就意味著出現一個兩極化的世界體系。第三種類型的出現主要表明上等階層並沒有遭到其他階層的一致反對，因為中等階層既是剝削者，又是被剝削者。這說明特定經濟地位並不是最重要的，通過現代世界體系的各個歷史階段它已發生了改變。我們會扼要地討論一下這些變化。

那麼，階級分析又在哪裡適用於所有這些對象呢？在這個觀點中，民族、國籍、人民、種族群體又各是什麼呢？首先，現在

不爭論這些，⁴¹ 我會證明所有這些術語都是一個現象的變化，我將這個現象稱為“種族國家”。

這些階層和種族群體或地位群體或種族國家都是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現象。我們在具體分析其功能時所遇到的大多數困惑，都可以簡單歸咎於以下事實：這些分析僅認為這些現象是存在於體系內各個民族國家中，而非在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這種肢解分析就是一張普羅克魯斯蒂（Procrustean）床。

當核心國的經濟活動範圍遠遠大於邊緣地區的活動範圍之時，辛迪加股份集團的活動範圍也相應擴大了。⁴² 因此，人們已廣泛地注意到，現今，在世界上許多地區都不存在歐洲或北美國家的那種無產階級。但是，對這種現象觀察的表述方式是混亂的。工業活動被不均衡地集中在世界經濟體系的某些地區，而產業僱傭工人主要集中於某些地理區域。產業工人作為辛迪加組織，他們的利益是由他們同世界經濟體系的共同關係所決定的。他們影響世界經濟體系的政治功能的能力受制於他們在某些主權實體中控制比其他實體更多的人口。他們的組織所採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受著這些政治界限的束縛。工業資本家同樣如此。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結構性的位置和利益的話，我認為，階級分析完全能夠解釋諸如法國熟練工人的政治處境之類的問題。種族國家也是一樣。核心地區的種族意識同邊緣地區的

⁴¹ 我的更充分的分析見“Social Conflict in Post-Independence Black Africa: The Concept of Race and Status-Group Reconsidered”，Ernest W. Campbell 編：*Racial Tens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 Press, 1972），第 207~226 頁。

⁴² 這句中的範圍的意思是相當比例的人口所從事的不同職業的數量。因此很典型，邊緣社會所擁有的職業很合理地分佈於所有 Colin Clark 的三個部門。如果我們撇開範圍的涵義而談生活方式、消費模式甚至收入分配，相當可能地我們會得到相反的關係。在一個典型的邊緣社會中，自給農民和城市專家之間的差別可能要比在一個典型的核心理會中所發現的差別大得多。

種族意識在意義上有著明顯差異。這主要是因為這些種族群體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階級地位是不同的。⁴³

種族國家的政治鬥爭或國家內部的階級分化當然是地方政治的家常便飯。但是只有清楚地闡明他們的組織活動或對世界經濟體系功能的政治要求的深層含義之後，才能成功地分析其結果的重大意義。如果以“左”和“右”為評估標準的話，那麼這也會不經意地對這些政治活動作出更加合理的評估。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功能要求各群體在單一世界市場中不斷追求經濟利益，同時試圖通過組織對其他國家（這些國家中有一些比較強大，但沒有一個能完全控制市場）施加影響以扭曲市場為自己謀利。當然，通過更進一步的觀察，我們會發現一個國家在有些時期相對非常強大，而在另一些時期內其力量較分散，並受到挑戰，在這時弱小國家的行動範圍就得以擴大。我們可以將世界體系的相對鬆散或緊湊作為一個重要變量，並試圖分析為什麼這種現象基本上是自然循環，似乎已延續了幾百年。

現在我們來考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本身的歷史演變，並分析到何種程度時才能夠成功地將演變中的各個階段視為一個體系。在“漫長”的16世紀（1450~1640年）能夠出現歐洲世界經濟體系是一個歷史的巧合：它順應了長期以來的趨勢，即長期以來所描述的“封建主義危機”的結果伴隨著一個更為迅速的週期性危機及氣候變化，這些變化導致了一個困境，只有通過勞動分工的地理性擴張才能將其解決。而且，體系內力量相對平衡，可以保證擴張的進行。因此，地理擴張確實是伴隨著人口增長和物價上漲而出現的。

⁴³ 見我的：“The Two Modes of Ethnic Consciousness: Soviet Central Asia in Transition?”，Edward Allworth 編：*The Nationality Question in Soviet Central Asia*（New York：Praeger，1973），第168~175頁。

最顯著的事不是歐洲世界經濟體系的產生，而是它從哈布斯堡試圖轉變為世界帝國的企圖（急切希望實現這一願望的人是查理五世）中倖存了下來。西班牙人試圖囊括整個體系卻失敗了。因為19世紀內的經濟—人口—技術急速發展，使得整個活動耗費太大，超出維持帝國基礎的限度。尤其是西班牙王國的經濟發展出現嚴重的結構性不足。西班牙既不能維持官僚制度，也不能負擔活動所必需的軍隊，因此最終走向衰敗。法國領導者也作了同樣努力，儘管他的企圖更無實現的可能。

當哈布斯堡的世界帝國夢破滅——於1557年永遠地破滅之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便穩固地建立起來了，且不可動搖。它很快同其他世界體系（奧斯曼土耳其和俄羅斯世界帝國及印度洋原世界經濟體系）形成勢均力敵之勢。歐洲世界經濟體系中每一個國家或潛在國家，都很快地加入到一系列競賽中：官僚化、常備軍的建立、文化的同化、經濟活動的多樣化。到1640年時，西北歐的國家已經成功地確立了其核心國家的地位；而西班牙及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國家，卻淪落為半邊緣地區；東北歐和伊比利亞美洲（Iberian America）已成為邊緣地區。此時，由於原先的超群國家的衰落，那些處於半邊緣地位的國家也因此成了邊緣地區國家。

在1650~1730年的整個體系範圍內的經濟衰退中，歐洲世界經濟體系得到了鞏固，並開闢了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第二個階段。由於經濟衰退導致開支緊縮，剩餘價值也因此相對減少，所剩空間也只容得下一個核心國。各國鬥爭方式是重商主義，這是一個同覆蓋大部分地區的世界市場局部隔離並從中撤退的計策，而這個市場，正是他們自己即世界經濟體系內的帝國（與世界帝國是迥然不同的）按照森嚴的等級制度建立起來的。在這場鬥爭中，英國首先把尼德蘭從商業第一的寶座上趕了下來；接著，又成功地將法國甩在後面。1760年以後，當英國正加速發展其工業化進程之時，法國的資產階級勢力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試圖摧

毀英國即將獲得的霸權。這一努力的表現首先是大革命中法國政權的更迭，後來是拿破崙對全歐洲的封鎖。但最後，法國失敗了。

此後，世界體系的第三個階段又開始了。這是一個工業資本主義階段，而非農業資本主義階段。因此，工業生產不再只佔世界市場的一小部分，而在世界總生產中佔了更大比例，並在世界總剩餘價值中佔有更為重要的地位。這對世界體系也產生了一連串的影響。

首先，它促使歐洲世界經濟體系的地理擴張如今擴展到全球。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其技術應用。這主要體現在改進的軍事武器、先進的航海設施保證了正常的低廉商品貿易的進行。但是，工業生產也需要大量的天然原材料，其需求數量非常鉅大，以致在原先範圍內無法得到滿足。然而，一開始，地區性擴張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並不是尋求新市場。因為，正如我們會看到的，在舊的範圍內新市場很容易得到。

歐洲世界經濟體系的地理擴張意味著削弱其他世界體系並兼併殘存的局部體系。當時，除歐洲世界經濟體系之外，最重要的一個世界體系是俄國。鑒於其國家機器的力量（包括它的軍隊）及 18 世紀時的工業化程度，它落到了半邊緣地區的地位。對拉丁美洲國家而言，獨立絲毫沒有改變他們處於邊緣地區的境地，只是削弱了已淪為半邊緣地區的西班牙在當地的殘餘勢力，而且結束了拉美內部仍處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狀態。19 世紀，亞非也被納入為邊緣地區，只有日本，因為其國家機器較強和資源匱乏（這使得世界資本主義勢力對其不感興趣）以及在地理上遠離核心地區，因此能很快成為半邊緣地區。

非洲成為邊緣地區的一部分，預示著世界範圍內奴隸制的終結。其原因有二：首先，曾經被用作奴隸的勞動力，如今已被用來在非洲內部從事經濟作物生產。而在 18 世紀時，歐洲人曾試圖

抑制此種經濟作物的生產。⁴⁴ 其次，一旦非洲從體系外進入邊緣地區成為邊緣地區的一部分，那麼奴隸制就變得無利可圖了。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得先瞭解一下奴隸制經濟學。奴隸的勞動所得少得可憐，其結果是形成了產量最低的勞動生產形式並導致了奴隸壽命的急劇縮短（主要是因為營養差、受虐待和在體力上缺乏對死亡的抵抗力）。此外，如果奴隸是從其工作地周圍地區掠奪而來的話，那逃跑率便會很高。因此，可以肯定，高額運輸費換來的卻是低下的生產率。只有當奴隸購買價格幾乎為零時，其勞動才會有經濟意義。在資本主義市場貿易中，通常是全價購買。只有在遠程貿易即奢侈品交換中，對購買者而言，購買價格才可能在購買者的社會體系中幾乎為零。奴隸貿易便是如此。奴隸在當地價格很便宜（實際上就等於與之交換的產品的成本價），不需要一般的無形費用。也就是說，從西非掠走一個男人降低了這一地區的生產潛力的情況對歐洲世界經濟體系而言，卻是零花費，因為這些地區不在勞動分工範圍之內。當然，如果奴隸貿易耗盡了非洲進一步提供奴隸的能力，那麼資本家便得開始花全價去購買奴隸。但是，那一刻在歷史上永遠都不會到來。然而，一旦非洲成了邊緣地區的一部分，那麼用於在世界體系中創造剩餘價值的奴隸的實價便會直線上昇，以致於在糖和棉花種植園中，使用奴隸遠不如使用僱傭工人合算。此類現象就於 19 世紀時發生在加勒比地區及其他使用奴隸勞動的地區。

⁴⁴ A. Adu Boahen 引用了英國貿易委員會在 1751 年給 Castle 角（一個小的英國要塞和貿易停泊站，今天稱加納）總督企圖阻止當地的 Fante 人種植棉花的命令。其理由是：“在黑人中提倡種植和工業是與已確定的他的國家政策背道而馳的，無需說在哪裡阻止，它可以擴展到煙草、雪茄和每一種其他我們現在從殖民地獲得的商品；因此，那些現在依靠戰爭而支撐自己的非洲人將成為耕作者，他們的奴隸將受僱於非洲這些物品的種植中，他們可以受僱於美洲。”引自 A. Adu Boahen, *Topics in West Africa Histo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66), 第 113 頁。

由於擴張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大批新興邊緣地區，體系內其他一些地區的角色發生了轉變。特別明顯的是，美國和德國（在它產生之時）就是邊緣和半邊緣地區的結合體。當邊緣地區在世界經濟中的關鍵作用略微減小時，兩國內的製造部門就能獲得政治上的支配性的優勢。如今，重商主義已成為半邊緣地區追求成為核心國家的主要工具。因此，其作用也同 17 世紀後期和 18 世紀英法的重商主義所起的推動作用一樣。可以肯定的是，半邊緣國家為實現“工業化”而進行的鬥爭，取決於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取得的不同程度的成功：美國完全成功；德國部分成功；俄國根本沒有成功。

在工業資本主義階段，核心國家內部結構也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作為一個核心地區，工業主義也包括從根本上拋棄所有的農業活動（20 世紀先進的機械化創造了一種新的耕作方式，其機械化程度非常高並被賦予工業化稱號，此種農業活動除外）。因此，在 1700~1740 年經濟衰退期的頂點，英國不僅是歐洲首要工業品出口國也是領先的農業品出口國。而到 1900 年時，英國僅有不到 10% 的人口從事農業事務。

起初，在工業資本主義制度下，核心國家通過工業品貿易來對抗邊緣區的農產品——因此，從 1825~1873 年英國被稱為“世界工廠”。甚至對於那些有一些製造業的半邊緣地區（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美國），這一時期英國也提供了約一半的工業產品以滿足其需求。然而，此後這些國家的重商主義實踐不僅切斷了英國在它們國內的商品銷路，而且在邊緣地區與英國展開商業銷售競爭，即導致 19 世紀後期“爭奪非洲”的競爭。此時，只得對國際分工進行重新分配，從而賦予核心國一種新的特殊角色：減少工業品的供應，多提供用於生產工業品和進行基礎建設的機器（這一階段尤其是在鐵路建設方面）。

製造業的興起首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造就了大規模的城市無產

階級。結果也首次出現了米歇爾斯（Michels）所說的“反資本主義大眾思潮”，⁴⁵ 並將之進一步發展為具體的組織形式（工會、社會主義政黨）。這種發展導致出現一種新因素，對國家的穩定和現行資本主義勢力的穩固統治構成威脅，這同 17 世紀在地方上反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者當中產生出來的最初的離心力所起的作用一樣。

與此同時，核心國家的資產階級面臨著國家結構內部不穩定的威脅，同時也面臨發生在 19 世紀後期的第三次經濟危機。此次經濟危機之所以發生，是由於農業產品（實際上也含有輕工業品）生產過度，超出潛在的市場需求。剩餘價值中的一部分，被重新分配給那樣一些人，使之用於購買這些商品從而使經濟機器能夠恢復並穩定地運轉下去。通過擴大核心國家工業無產階級的購買力，同時解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兩個問題：核心國家瓶頸式的需求（供過於求）和尖銳的“階級矛盾”——因此，恰在這時興起了社會自由主義或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

正如當時人們所觀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而 1917 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則開始了一個新時代——即我們的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是（肯定是）一個充滿革命動亂的階段，但也好像是工業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得到鞏固的階段。俄國革命本質上就是因為一個半邊緣國家其內部力量失衡導致 19 世紀後半期開始向一個邊緣國家滑落。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外國資本向正在翦除所有本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工業部門進行明顯的滲透；農業部門拒絕實行機械化；軍事力量相對衰弱（1905 年被日本所擊敗，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革命使國家領導階層有權利用不完全從世界經濟體系中撤退的、典型重商主義的技巧，來扭轉這三種趨勢。

⁴⁵ Robert Michels：“The Origins of the Anti-Capitalist Mass Spirit”，*Ma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Vol. I，第 740~765 頁。

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現在的蘇聯調動了數量可觀的民衆支持，尤其是在城市裡。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俄國又恢復為半邊緣地區的一個強大成員，並開始謀求完全的核心國地位。

同時，英國從 1873 年以來便日趨衰落，其霸權為美國所取代。而當美國由此崛起之時，德國由於軍事上的戰敗而愈加落後。在 20 世紀 20 年代，德國作出種種努力，力求在中東和南美洲找到新的工業出路，但是在美國的強大實力加上英國的繼續相對強大面前，其努力均以失敗告終。於是，德國便孤注一擲，試圖以危害極大的和不成功的納粹主義收復失地。

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能夠在短期內（1945~1965 年）上昇到英國在 19 世紀初期的首要位置。美國在這一階段的發展是引人注目的，同時也產生了對擴大市場出路的鉅大需求。冷戰不僅終止了美國對蘇聯進口貿易，也終止了東歐對美國的出口。同時，中國革命也意味著企圖在這個地區進行大規模開發活動的願望的破滅。美國可以在三個可能的地區獲得市場出路，但每一個都使美國付出了艱苦的努力。首先，西歐必須迅速得到“重建”，所以馬歇爾計劃容許這一地區在世界生產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其次，由於當時英德投資已被排除殆盡，拉美便成了美國的專門投資地。第三，南亞、中東及非洲必須非殖民化。一方面這一點有助於減少西歐調解人在該地區所享有的剩餘價值份額，就像坎寧（Canning）於 19 世紀 20 年代秘密支持拉美反抗西班牙的革命。⁴⁶但是，這些國家為了能以殖民時代從未出現過的一種方式開發其生產潛力也必須被非殖民化。畢竟，殖民統治是核心國和邊緣國之間一種劣等的關係模式，它引起了 19 世紀後期工業國之間的激

⁴⁶ William W. Kaufman : *British Policy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 第 1804~1828 頁。

烈衝突，但已不再為新的霸權力量所青睞。⁴⁷

然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會允許真正最高統治權的存在。查理五世不能成功地實現其帝國夢。英國強權下的和平促使其掘墓人的產生。美國亦是如此。在每種情況下，政治上最高統治權的代價在經濟上是非常高昂的。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當利潤剛剛減少時，就會尋求新的政治方案。在這種情況下，各方面的費用都會上昇。蘇聯進一步深化其工業化進程的努力、保護其特權市場（東歐）以及強行進入其他市場，從而導致了軍費開支的螺旋上昇。從蘇聯立場來看，這預示著對美國的長期回應，這僅是一個迅速站穩腳跟的問題。西歐經濟復興，不僅為美國提供銷售和投資市場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對付蘇聯軍事威脅的需要，且意味著所有西歐國家結構共同變成和美國一樣強大，這導致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出現“美元和黃金危機”和尼克松從自由貿易立場上的退卻（這是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一個自信領導人的決定性的標誌）。當第三世界積聚的壓力（尤其是越南）不斷增大時，重新進行國際分工便成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其結果，可能就是 20 世紀 70 年代由美國、歐洲共同市場、日本和蘇聯四家共同瓜分世界上大部分的剩餘價值。

美國國家霸權的衰落，實際上增加了資本主義企業的行動自由。如今，大部分企業採取了跨國公司的形式。這樣，無論一個國家的政治家對國內工人壓力的反應多麼強烈，這些公司都能巧妙地應付該國政府的官僚機構。在這些跨國公司之間能否在目前有限的運作範圍內、在某些地區建立有效的聯繫？在蘇聯，這一點尚不明確。但是，蘇聯是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的。

⁴⁷ Cathérine Coquery-Vidrovitch : “De l’ impérialisme britannique à l’ impérialisme contemporaine-l’ avatar colonial” , *L’ 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18. oct. -nov. -déc. 1970, 第 61~90 頁。

這又把我們帶到這篇論文一開始所討論的問題——在劉少奇與毛澤東之間展開的、貌似高深莫測的辯論。劉少奇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存在連續不斷的階級鬥爭的過程。對那些不懂術語的人來說，在理論上，這個討論無疑是深奧難懂的。然而，正如我們已說過的，這個爭論確實如此。如果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確實是對俄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結構性地位進一步衰落的反應，如果50年後，人們可以認為蘇聯已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處於核心國地位，那麼，出現在第三世界中的各種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又意味著什麼呢？首先，讓我們注意俄國、中國、古巴都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而泰國、利比亞、巴拉圭都沒有。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要發生此種革命，就必須在革命前就擁有國內經濟結構，一定程度上的最起碼的力量——熟練工人、一些製造業——和另一些因素。這些因素使得該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框架內能夠利用重商主義的半撤退技巧，在一個合理的時期（比如說30~50年）改變其在國際勞動分工中的地位（這可能在古巴行不通，但是我們會看到）。當然，其他處於革命力量控制下的地理和軍事範圍內的國家，雖在各個方面都不具備這些特徵，但已發生了政權的更替（比如蒙古或阿爾巴尼亞）。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有些類似的力量非常強大或需要可觀的相反力量阻止第一類力量出現的國家，也擁有這種最起碼的力量。這類國家我認為有智利、巴西、埃及，或實際上還有意大利。

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在半邊緣國家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第四個階段不斷適應的過程中，一種新的政治體系的出現嗎？這些國家中的所有企業已經國有化，本身並沒有使它們的企業參與一種突破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固有運轉模式的世界經濟體系。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傳統運轉模式是：不斷尋求提高生產效率以最

大限度地提高商品銷售價格，從而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的分配。如果美國鋼鐵業以後變成了工人的集體企業，其中，所有工人都毫無例外地分享相同的利潤，所有股東的股權都被無償沒收，那麼，它還會是一個運作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資本主義企業嗎？

許多不存在基本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國家出現在世界體系中，又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呢？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內部消費量的重新分配。資本主義企業家的政治軟弱性以及私有制與迅速發展的工業生產之間的差距，反映出世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合理性已明顯被“重新分配”削弱了。“重新分配”提高了新的半邊緣地區分享更多的世界剩餘價值份額的能力，從這個程度上來看，它重新創造了世界體系得以維繫的根本因素——三個相互依賴的社會階層，從而使世界再次趨於平衡。

最後，在世界經濟體系內的邊緣地區，核心國家內持續的經濟增長（儘管核心國家認為這是其內部的剩餘價值的分配）和半邊緣地區的新生力量已導致了邊緣地區政治、經濟地位的進一步下降。權威人士表明，“差距在進一步拉大”，但目前極少有人成功地為消除這種現象做些什麼，而且是否有許多人對那樣做感興趣尚不清楚。在差距日益拉大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權威不僅得不到增強，相反，在世界的許多地區我們正在看到類似於16世紀人們所熟知的波蘭的形勢惡化，而軍事政變的頻繁發生只是這種形勢惡化的標誌之一。所有這些促使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第四階段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鞏固的階段。

然而，鞏固並不意味著矛盾的消失，也不表示這種體系可能長期存在下去。因此，我們就對未來進行預測，這一直是人類偉大的遊戲、人類的真正的自負，是原罪教義最令人信服的論據。讀過但丁，我因此只能作些概述。

在我看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運作過程中存在兩個基本矛盾。首先是 19 世紀主要的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來的矛盾。具體內容是：短期內要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就需要從大多數人的即時消費中最大限度地攫取剩餘價值；而長時期內剩餘價值的持續生產需要大眾需求，這種需求只有對所獲取的剩餘價值進行重新分配才能被創造出來。由於這兩種因素朝著不同方向運動（“一對矛盾”），體系便不斷出現危機，長此以往，這些危機既削弱體系，又降低了特權階層對所玩遊戲的興趣。

第二個基本矛盾，是由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過程理論所提出來的，其內容是：不管特權者如何想用擴大特權的享受範圍的辦法來處理反抗運動，他們都無法在短期內消除反對者；但是他們能預見下一次世界經濟危機所產生的下一個反抗運動。因此，“增補”的代價會越來越高，而其好處卻似乎會逐漸減少。

今天，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社會主義體系並不比封建主義體系多，因為只有一種世界體系。這是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並且在形式上被界定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一種新型的世界體系，它既不是重新分配的世界帝國，也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而是社會主義世界政府（World-government）。我並不認為這個設想沒有一絲烏托邦的色彩，而且我不認為它會很快建立。它將是一個長期鬥爭的結果。其鬥爭形式可能是我們所熟悉的，也可能是即將在世界經濟體系的所有地區風行的新形式（毛澤東的不斷的“階級鬥爭”）。世界政府可能掌握在支持這種轉變的人民、群體或運動手中。但這樣一來，各個國家既無進步性也無合理性。只有運動和勢力應該得到這麼高的評價：既具進步性又具合理性。

既然已大膽地預測了未來，那就讓我們回到現實，回到學術討論。學術活動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擁有自己的邏輯，在某種程度上，它擁有自己的優先關注點。我們簡要描述了世界體系觀

及其結構成分和演化階段，把它們作為我們的基本的觀察單位。我認為，正是在此種框架中，我們能夠富有成果地對整個世界體系及其組成部分進行比較分析。思想先於實踐，同時指導實踐。我完全贊同精確和縝密的定量分析；我也完全贊同精確而勤奮的文獻檔案工作，它會從所有當前的複雜難題中追溯一系列具體的歷史事件。然而，這兩點都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過去和現在發生的事。因為我們需要用“眼鏡”來區分事物差別的大小，所以，我們就得用各種模式去衡量其重要性，用總結性的概念去創造能試圖和別人進行交流的知識。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是擁有自負和原罪的人類，因此我們追求真、善、美。